

陇上学人文存·支克坚卷

范 鹏 总主编

支克坚 著

刘春生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支克坚卷 / 范鹏总主编; 支克坚著;
刘春生编选.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6-03949-6

I. ①陇… II. ①范… ②支… ③刘…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529号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支克坚卷

范 鹏 总主编

支克坚 著 刘春生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7 字数269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3949-6

定价: 48.00元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



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

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前言一般写于最后，对一部选集而言尤其如此，而对一个他人选集的编选者来说，则必须如此，否则，无论说什么，皆难免先入为主之嫌——编一部书虽然也需要“布局”，到底不同于博弈，占先只怕讨不到便宜，只够讨嫌：人家千言万语白纸黑字俱在，你叉手叉脚地挡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么说来，编选者这点儿照（体）例而来的“话语权”未免可疑，也许大可不必，因为一部真正值得持存的书必定是自己会开口说话的，用不着别人越俎代庖。那么先吆喝几声，权作广告？这是只有明星名人之流才能做而且能做出效果的事情，而且其效未必果然在学术之存续传承。如此这般，我确实很想含糊而淡出，悄悄破例隐遁，卸掉这桩不讨好的差事；但所谓编选，毕竟意味着我在这部书上动了手脚，虽然并不因此就有了代著者立言或对之评头论足的特权，却有从实交代因由的责任，何况既有体例在先，复有敬业而眼神锐利的责编鞭策于后，似乎不容许谦虚掉这么几页文字，所以磨蹭到最后，还得上前而言。说什么呢？想来想去，一个编选者应该或必须交代的大约只有两件事：为什么编这个选集？为什么如此编选？剩下的就是作者与读者的事了——学术对话所需的聚精会神的程度不亚于乃至有甚于谈情说爱，知趣者最好别横加干涉。

先说第一件事：为什么编这个选集？因为他是支克坚，因为他的杰出的学术成就，因为其文可存。当然，我得赶紧声明，这不是我的私见。著名文学史科学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陈子善先生曾如此评价：“支克坚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着重要影响，他是西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盖棺论定，我不能说众口一词，但确实尚未见有何异议。说实话，在因编这部选集而通读支先生的著作之前，即使见此评价，我也不敢妄加是非；编完之后，此时此刻，我依然有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词的战战兢兢，不过却能够认同陈子善先生之论，并为做这件事的价值和意义而心安理得了。我唯一感觉不安的是，这部选集是否真正完整体现了支先生的学术成就，乃至体现了支克坚之为支克坚——一个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家？这是事后我想要也应该反思并说明的第二个“为什么”。

一 结构

选事之难，历来为中外古今的选家所长慨短吁，以至于“选”而成“学”（不是或不仅仅是指因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而兴的“选学”）。文多比不得钱多，金钱这种性质均匀的东西真要花好尚且作难，文之有贤愚不肖，其复杂不亚于人，选精擷华更是不易，难怪其中有学问可做。即使同一作者的作品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见识、尺度选出来，也可能面貌迥异甚至大相径庭。当然，这是说选家难免有人性必有的一偏之见，也正因为如此，选事的理想或最高境界是无偏见的“呈现”，也即孔夫子所说的“述而不作”——那些“现代的，太现代的”人会以为这是没有所谓的创造性，这自然是既没见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者的想当然；真正动手选起来，恐怕比自顾自作文还为难，因为除了自以为的“应该”还得顾及被选者的“本来”——获得并且呈现出这样的真实本来就是天底下最难之事。因此说到这个选集，我只能说，我竭力呈现支先生学术思想的真实本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支先生三十年（1979—2008）的学术著述生涯，留下了三部专著（《冯雪峰论》、《胡风论》与《周扬论》）、一部论文集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和晚年一批未结集的论文。本卷从中选出二十余万字，分为五辑，每一辑中的文章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力图兼顾其历时性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与共时性的学术思想结构，从而坐标式纵横交错地呈现出其学术思想的全貌。本卷的目录可以大体看作支先生学术思想的一幅草图（参照书后所附按发表年代顺序排列的著述年表会更清晰）：如果说从前三辑四论可以看到其思想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历时性地次序推进，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鲁迅精神），那么第四、五辑呈现的则是其思想结构（包括其视野与方法论）的剖面图。

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将支先生的三部个案研究专著称为“三论”，从支先生著述的整体看，还应该加上一个“鲁迅论”，虽然此论并未形成专著出版，但其数量、质量和系统性都足以构成一部专论，所以本卷列为首辑。而这个“首”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支先生的鲁迅论，从他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直到晚年，可以说是贯彻始终，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端和主线；其次，虽然支先生的鲁迅论可以视为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个案研究之一，但与其他三论不同的是，鲁迅论还是他全部学术思想的根基和灵魂，换言之，支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从立场、方向、精神到具体方法，都是源于、基于鲁迅的，这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里都显而易见。因此，本卷始于鲁迅论亦终于鲁迅论，既是由于支先生著作的发表时间有此巧合，更因为这个所谓巧合所体现的是支先生学术思想的内在脉络。

1992年，支先生出版了《冯雪峰论》与《简明鲁迅词典》（主编）；1999年，支先生将“1979年以后写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文章，共计二十五篇”结集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出版（这期间发表的文章还有三篇并未入集，不知是漏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翌年《胡风论》出版。至此，支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具体说是以鲁迅精神为导向和基础、以中国革命文



学（思想）为主论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现在从鲁迅而展开为冯雪峰论与胡风论两个个案研究，以其“异端”性质而凸现出革命文学内部的也是内在的矛盾与张力，由此摊开并深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因此，本卷将“胡风冯雪峰论”合为一辑。本来，我打算冯、胡各为一辑，因为支先生也各有专论，但由于篇幅限制，只好合并，幸运的是这一合正好合乎支先生自己的理路和思想结构——他把冯、胡视为鲁迅一脉，是革命文学内部继承鲁迅思想的一个“流派”。需要说明的是，此辑若按我为本卷设计的“体例”，当题为“冯雪峰胡风论”，但我稍稍放纵了一下自己的“美感”，没有改正现在这个出自汉语节奏本能顺口念出来的标题。革命文学内部的另一个时为“正统”的“流派”，自然是以周扬为代表，故“周扬论”单作一辑。如此，前三辑形似“丫”字，呈现出中国革命文学一千二枝的历史面相，同时这也是支先生关于中国革命文学的思想结构的“图式”——二者的高度契合，说明支先生的研究和思考真正深入到了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内在的血脉肌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把握并呈现出了其历史的真实。

这个历史真实与思想结构若合符节的“丫字图式”，同时也是支先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论体系的“图式”，回头看他的全部著述，这样一个结构应该说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支先生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思想）历史，同样是一千二枝；因此，他的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始终是在其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相对待而形成的矛盾-张力中展开和深入的，虽然他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尚未及充分展开，但这仅仅是说尚未完全文本化，而这个张力结构的广度与深度，在他发表的著述中可以说是已经被显示出来了，如果我们读书得间，读其文字“之间”，或者说不仅读其所见，而且读其所以见与如何见的話。本卷辑四所欲呈现的即是这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与支先生关于它的

思想的双重叠合的张力结构，在我看来，这是支先生所把握到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动力结构，也是他的学术研究得以展开、推进并且深入的思想动力结构——我好像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我所理解的支先生学术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此辑有《当前的文艺思潮与现代文学研究》一文在的原因：他这种犹如拉开弓弦一般的思想方式，也体现在他的问题意识的当代性，我是说，支先生之能够入乎史内又出乎史外，端在其思想中还有这样一个孕育或指向未来的“现在”与“历史”的张力，我们在“周扬论”之末所见那支飞向未来“人类的文学”之箭，是在这样一张弓弦上射出的。我以为这是支先生作为一个史家的史识或思想性之所在，而不是一个仅仅爬剔故纸堆而不得出的学究，也不是一个无视历史性的源流向度而只在眼下目前的时代风潮中随波逐流的学界浮瓶。

如果说前四辑呈现的是支先生视域的深广度及其所见，那么辑五则试图展现其所以见与如何见。支先生的自述文字不多，此辑收入了他全部著作的后记，心事浩茫连广宇，这些难得吐露的学术背后的若干“本事”与心境，虽则含蓄蕴藉，或有助于对支先生学术研究及其语境的真实理解。此辑以及全书以支先生和他的一位学生的对话作结，既因为这是支先生晚年的反思性总结，也由于对话形式的这个“对”实在是他思想特征的极恰切的展现，颇有《易经》终了那种既济未济的气象神韵，对而话之，余音不尽，曲终奏雅，手挥目送，不亦宜乎？！

如此说来，我似乎是将支先生的全部著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进程和结构“听”成一首乐曲了。就支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本来而言，我想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以鲁迅（“立人”）精神为主旋律的这首中国现代文学“乐曲”，前述大小两个所谓“丫字”结构，正不妨视为其展开部，入乎其内，我们看到其间的“斗争”；出乎其外，这“斗争”又何尝不是同一历史乐章内的“和声”或“协奏”？！这历史的交响也正是支先生作为一个史家所



“听见”并欲呈现的吧——于是他的学术思想本身，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看，展现为一个富有韵律感的严谨结构，几乎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换言之，他尽到了一个史家的本分，没有戴着什么时髦的眼镜而歪曲历史的真实及其“规律”，更确切地说，他所做的正是尽其所能摘除各式遮蔽性的“眼镜”。或许还可以说，这种本分，这种最起码的史德恰恰是极难以达至的高境界的史识，“泰斗”云云，良有以也！与其仰其高明，毋宁见其诚实和建立在诚与实基础上的不盲从任何“权威”及一时风气的学术勇气。

言到此处，我得再次承认，这部选集是否能让读者全面、真实地读出支先生学术思想的原本结构和韵律，我没有把握。也许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戴着镣铐跳舞”所致：限定的篇幅使我不得不大加删削——当然，这是推诿之辞了；另一个现成的借口是水平有限云云，既是借口，不说也罢，倒不如实在交代一下无论水平怎样都已用在编选之中的“原则”：一是不增不减，凡已选入的文章，除尽量改正明显的印刷错误之外，悉依原样，包括其注释；选自专著的文字亦然（唯“周扬论”二文题目为编者所加），其中多有“如前所述（引）”之类，由于支先生习惯于再述（引）一次，并不影响连贯的阅读理解，所以我一概保留，这也是出于为愿意更深入地研读其著作的读者留下其“路标”或指引功能的考虑。二，这一“路标原则”也被用于全书的编选，篇幅有限而欲“全面真实”，不得已，我只能指望选入的文字能够交叉指引而“互文相足”，比如“鲁迅论”里，我没有选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鲁迅研究之名文的《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而选入《〈阿Q正传〉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因为后者在更为深入的同时也“涉及”或“包含”了前者的论题或论域，可以由此而“指引”至彼；每辑之中如此，各辑之间亦当作如是观。

二 观点

一个编选者该说的话似乎已经说完了。那么为什么还不打住呢？也许我多少有些“形式主义”倾向，觉得既然没能免了这叠床架屋的活计，好歹是篇文章，这篇前言的前言之后，撷一节文字在这里，形单影只的不够平衡，所以总有些意犹未尽之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形式导引”。我想这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中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将学术和思想也视为一种艺术的话；也就是说，和艺术家一样，在一个成熟的学者的思维里，美感与形式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他是否自觉。这样的形式感是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敏锐的标志，因为正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或者说，是它引领着思想的拓展并向纵深掘进；我甚至以为，它是所谓学术良知的的基本成分。我之所以提出这种“形式导引”现象，自然不是要在此专门谈什么“思想艺术”或“学术美学”之类话题，而是想借此谈一点对支先生著作的颇具私人或主观性质的“看法”——“客观”的编选状况交代完毕，我想不妨稍稍“主观”或自由一些，谈谈我是怎么看支先生的“看”和“看见”的，说到底，前文所言之凿凿者，不过是我所见的支先生之所见而已，而他站在哪里如何见其所见？

“观点”云者，此之谓也。

我们通常所谓的“观点”，多半说的是某个人看见了什么，好比照相，大多只关心照片，也就是被拍摄到的东西，而实际上，拍摄者站在何处、取什么角度、用什么相机或镜头才是更关键的事情。那么不妨望文生义一回：一个人的观点，即其所立而观及所以观之点。找到这个“点”，任何人皆可同样见其所见，因而能够“同情地理解”，否则对其所说倒背如流也未必真正理解。因此，我不想在这里编写支先生著作的“内容概要”，除了对“观点”的这种理解以及本卷末的对话中有支先生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反思总结之外，还有两个次要一些的原因：比较主观的原



因是我不喜欢此类“内容概要”，因为它的“方便”往往导致思想的懒惰与浮泛，其弊远甚于其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较客观的原因是，阅读支先生的作品，我一直有“滞重”之感，或者说，他的著作属于那种不宜快读的文字，我想这与他文章的风格有关，虽然新见迭出灵气贯通，但其总体风格密实凝重，晚年文字尤其如此——这种风格的文字其实是一种吁请，或干脆说是一种拒绝：拒绝“概要”与印象式的泛读。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写在这里，权供参考。回头来看支先生的“观点”。

前文将支先生的著作即思想结构与他所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描述为一个“丫字图式”，如果倒过来写，即是一个“人”字。支先生的“观点”，若要一字以蔽之，就是这个——人！自然，这里的文字游戏不过是个巧合，但在我看来，这个“人”，确切说是“立人”，即是支先生学术思想的立足点，是他之所以见与如何见的立场之所在，也就是他《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所说的“新的思想高度”。那么这里有了一个问题：“人”或“立人”，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出发点和理想的归宿，支先生立足于此而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又何新之有、高在哪里？

且让我长话短说。我在前文谈到，支先生的鲁迅论是他全部学术思想的根基和灵魂，他的学术思想的立场、方向、精神到具体方法，都是源于、基于鲁迅的。这里指的即是“立人”的鲁迅精神。虽然鲁迅被称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旗手”，而支先生却在揭示鲁迅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根本分野的同时，一再指出鲁迅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色彩”或“味道”，或者说与自由主义相通的成分，这是意味深长的。或可如此表述：在支先生看来，由于中国现代历史实质上主要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政治革命的历史，从“立人”出发的中国现代文学逐渐演变为政治角逐的战场，文化的和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蜕变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即使是从未放弃独立思考的鲁迅，有时也不免陷入其中。这种情形，如支

先生所反复阐明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因此而同样必然且悲剧性的事实是，“人”也在这样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被遮蔽乃至失落了：如果说在革命文学内部，由于“人”的政治工具化，酿成了胡风、冯雪峰被视为“异端”而“革出教门”的悲剧；那么在他们自己标榜的与政治无关或超越了政治，恰恰是在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对峙中形成的。这是历史性的人与文学的悲剧。我想支先生文字的凝重风格，当源于他从这历史中体验到的悲剧感，也正是这悲剧感使他在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之后，竭力超越“当年论争的水平”而回归到以“立人”为宗旨的鲁迅精神，即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真精神，文学的真精神，此其所以为“新的思想高度”也。

支先生的这种回归性超越或超越性回归，不仅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的水平”而言，还应该置于他的研究和写作正在其中的当代文学与学术环境中看。还是长话短说。“文革”结束，“文学为政治服务”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万象更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被各种各样的新眼目重新度量，其中之一“新”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重新评价。恢复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乃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历史要真正翻开新页并不容易，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出现了一股“跷跷板”式的潮流，即进行简单化的颠倒，似乎不贬倒革命文学便无以彰显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与之相呼应的是理论上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贬抑。支先生在与他的学生的对话中所说的没有超出“当年论争的水平”，正是对此类现象而发。应该说，他的批评是公正的，从思想方式看，这种“跷跷板”式的思维，不仅因其实质上仍沦于重复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式思维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如此简单的颠倒使得历史的悲剧蜕变为喜剧。对照而言，支先生继承鲁迅精神，坚持在文学是人学的基础上维护文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维度，乃是真正站在了具体而非抽象的人的立



场上看文学及其历史，人与文学和历史因此还原为具有丰富内容的活生生的过程，而不是抽象观念非此即彼的颠来倒去；唯有把握到或接通了活的真实历史的现在，而不是又一头栽入历史论争中去“站队”——充分消化了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现在才能有希望生长出未来，此其所以为“新的思想高度”也。

然而与其仰其高明，毋宁见其诚实和建立在诚与实基础上的不盲从任何“权威”及一时风气的学术勇气——我想将这句话于此再说一回，也许并非多余。从学术的角度看，“新的思想高度”云云，实在只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平实度。我说形式感是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敏锐的标志、是学术良知的基本成分，无非指此而言。支先生是作为一个史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或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即使仅仅基于一个学者的立场，无论对革命文学还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他也不可能不对之有一个“格式塔”式的综观，所谓“丫字图式”，说明他的研究和思想中确有这种充分的“形式感”；而那种“跷跷板”式的或站队式的意识形态性思维所缺乏的也是这种“形式感”，如果不用伦理学语言说其缺乏学术良知的話。事实上，支先生是最早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在当代的回潮并予以重视、研究与回应的学者，我以为这正是“形式导引”所致：他对革命文学的深入研究，必然将其目光引向与之相对待的自由主义文学；同样，我以为也是这种“形式感”将他在完成《冯雪峰论》与《胡风论》之后引向《周扬论》的研究和写作——唯其如此，他才能以充满张力的思想方式超越“论争的水平”而达至“新的思想高度”，从而认知并呈现出历史的真实。他的学术思想在历时性进展方面所体现的韵律感，其共时性的思想及著作所体现的结构美感，洵非偶然。

此外，我想稍微提一下支先生著作的语汇问题。我隐约听到一种说法，嫌支先生的语汇陈旧，言下之意是其思想也因此过时了。这种逻辑自然是不成立的，我想是某种“泛读者”的皮相之

见。按这等逻辑，时尚杂志堪为学术楷模了。究实而论，学术只在乎与真理的远近，是否“回到事情本身”，何关乎词语之新旧！上面所说为支先生所批评的玩“跷跷板”者，大约是自以为与时俱进了，可是进到哪里去了呢？一头栽入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陈腐不堪的思维方式里去了。也许正因为这类思维方式“难看”，我才更愿意“艺术地”看支先生的著作及其思想方式而凸出学术、思想中的“形式感”这回事。我刚才一不小心用了个颇时髦的现象学词语，所谓“回到事情本身”，这又怎样？难道我因此可以自诩比支先生有更好的“还原”功夫、更新的思想了？虽说历史学的还原与现象学的还原不是一回事，但二者是可相通的，我是说支先生其实颇具现象学精神，这与词语无关，我们大可不必死在句下。

三 因缘

按常理，这部选集轮不到我来编选，支先生教书育人数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自然有更合适的人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而居然被我抢了来做，想起来真不免有找个人来讨论一番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这种哲学问题的冲动。我与支先生既无师生之谊，也从来没有私人往来；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细想想又未必然。当初“文存”工程启动，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这一卷我来编。近水楼台，本卷就这样“走后门”落到了我手里。木已成舟，只好说是缘分吧。

孟子那里传下来的老话：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话的意思显然是不可。但是这会儿我也拿自己没办法了，书编罢，抓耳挠腮写了一通读后感，表示读其书了，却无论如何不敢说知其人，若碰上亚圣之流，怕难免怀疑我读明白了没有。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都在这里了。至于其人，我趁此机会说说我所经历的有关支先生的几件事情，若对读其书不无小补，当然最好，没什么助益呢，只当是我自己对先生的一番感念，一如讨要编此书



时的心境。恐怕以后再不可能有机会来写这些事情了。

我一直记得那天上午的情景，因为那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上班时分，我背着包刚进单位大门，正往自己住的办公楼走，一辆轿车也进了院门，突然在我身边停下，车门开处，支先生探出身来，我一时间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好像很好奇似的将我上下打瞄一番，然后说，你回来啦。我才一点头，他迅速关上了车门。车当然比人快，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下车进楼，心里开始七上八下。我是在家里过完年又耗了大半个月，被父亲赶回单位的，因为我离开单位已经半年多了，虽然曾请过探亲假，明显大大的超限，大约都赚够被开除的本钱了，没承想一进门就被头儿逮个正着。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每天都准备着被传唤，甚至写小说似的不断构思着自己被发落的故事。可是——这是我唯一没敢构思的情形，可见想象力之贫乏——没有故事。这么过了半个月样子，我简直快要觉得自己从来没离开过单位了，于是乎继续读书，确切说是真正开始认真读书，直到现在——

这么一件事有什么微言大义？在某种“存在论”意义上说，从那以后我确实再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所在。这是人生的偶然抑或必然？谁知道呢！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支先生刚执掌我所在的单位不久。当时中国知识界正处在一个大分化时期，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十字路口。我记得自己请了探亲假，北上南下，东张西望，在北京待了一阵，又到深圳晃了几个月，依然彷徨无措，然后背着沿途买的一些书回家读书，然后被父亲赶回单位。如果支先生这位新官当时给我来一把火，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做什么。记录这样一件事，并非欣赏犯规。说实话，我不知道当时支先生为何那么处理或不处理，也许因为那是个对中国知识人来说非常特殊的时期？我想是的，作为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严谨史家，他更能够宽厚理解某些历史性的现实状况。无论如何，这个“偶然”决定了我的命运。此刻，我坐在